

历史转折时期 的政要名人传

《非常抉择——历史转折时期的政要名人沉浮录》

目 录

（中 卷）

【中】项英 （苑苑）

“二·七”大罢工的领导者，在《梅岭三章》所言的环境艰苦留守。与叶挺重振新四军后，却落入早已布好的“口袋”……

“二·七”大罢工中 （苑苑）
留守苏区 （苑苑）
组建新四军 （苑苑）

皖南事变中 (苑园)

【中】摇叶剑英 (苑园)

在四次历史关头,为党作出重大贡献的,就是被毛泽东称为‘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帅。

策应南昌起义 (苑园)

长征途中的密电 (苑园)

在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关头 (苑园)

请出小平来的日子里 (苑园)

【中】摇林育英 (苑园)

送信前后,两种断然不同的指示,带来极其重大的前途;共产国际指示的带回,为解决遵义会议之后的政治路线问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指南 红军长征中,为促使张国焘放弃‘第二党’作出重大贡献。这就是林彪的亲兄弟。

井冈山送信 (苑园)

带回共产国际指示 (苑园)

长征途中分裂的紧要关头 (苑园)

【中】摇林彪 (苑园)

活捉张辉瓒、夺取卢定桥、首歼日军、揭开解放全中国帷幕,在这一系列历史的关头,他威风凛凛地走了过来。然
九大与九届二中全会前后,却作出了另一种选择……

第四次反“围剿”	(殉愿)
泸定桥头	(殉愿)
平型关上	(殉愿)
辽沈战役中	(殉愿)
平津作战	(愿愿)
九大与九届二中全会前后	(愿愿)

项摇英

【中】摇项英

项英（~~员愿愿~~原~~员愿~~），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前期主要领导人。湖北武昌人。~~员愿~~年入党，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等职，长期从事工运工作。~~员愿~~年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员愿~~年在皖南事变中遇害。

摇摇摇摇摇摇题摇摇说

“二七”大罢工的领导者，在《梅岭三章》所言的环境艰苦留守。与叶挺重振新四军河山后，却落入早已布好的“口袋”……

“二·七”大罢工中

京汉铁路“二·七”工人大罢工，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第一次工运推向了高潮，中国共产党从这次罢工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具体领导“二·七”大罢工的？谁是“二·七”罢工的具体领导人？迄今为止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都讲得比较模糊，一些回忆资料和专论的说法也不尽一致，概括起来，认为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有李大钊、罗章龙、陈潭秋、张国焘、史文彬、林育南等，几乎都忽视了项英，而实际上，项英自始至终参加了“二·七”罢工的领导，且一直战斗在第一线上。因此，他也应该是“二·七”罢工的领导者之一。

项英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即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入党后，他更是积极从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

1923年7月，项英作为武汉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发言，认为党内的工人同志太少是个缺点，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成份在党中应该占一定的比重”。因此，他提议：应吸收大量进步的工人入党，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他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受到了党的重视。会后，党派他前往郑州，参加8月10日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会议选出总工会筹备会负责人，杨德甫为主任委员，凌楚藩、史文彬为副主任委员。项英为总干事，吴汝明为副总

干事。经过筹备会负责人半年多的辛勤工作，京汉铁路各站建立了 5 个分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 猿万多人，说明成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3 年 5 月 缘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在郑州召开，项英又出席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定于 圆月 5 日在郑州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遍邀各工团、各界到郑州参加典礼。”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仇视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5 月 圆日下午，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到总工会传达吴佩孚的电令：禁止京汉铁路工人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总工会旋即派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 缘代表前往洛阳，希图与吴佩孚谈判，打开僵局，但仍遭到吴佩孚的拒绝。

怎么办？是坚持按期开会，还是屈从吴佩孚的压力？

在总工会筹备会负责人讨论会上，杨德甫认为，吴佩孚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京汉铁路工人成立工会。工会既然是合法的，工会成立大会的召开就不能不是合法的。不过，为了息事宁人敷衍吴佩孚，照顾他的面子，成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节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散，尽可能避免同军警冲突。凌楚藩说，吴佩孚既准我们成立工会，又不准开总工会成立大会，这是自相矛盾。会期已经到了，交涉还没有办好，我们可以改期开会，或是暂缓一两天，再派人与吴佩孚交涉。以上两种看法，表面看不无道理，但实际上，都未能识破吴佩孚的假面具，对他抱有希望。

项英持第三种看法。他认为，工人组织工会，求得解放，这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黄殿辰等辈是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障碍，如果工人成立工会都要得到他们的批

准，以后都要乖乖地听他们的话，那末我们的工会就没有作用了。他还坚定地说：“工会的招牌已经挂出了很久，事实上工会是已经成立了，根据既定事实，来开成立大会，还有什么话说呢？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把工会的招牌摘下来，大家散摊，不就完了吗？”很明显，项英是毫不犹豫主张总工会成立大会按期召开的。包惠僧回忆说，项英讲这番话时，“眼圈红了，双手发抖，几乎掉下泪来。”其革命态度之坚决，溢于言表，其对军阀的认识，亦颇深刻。他的话感动了每一个人，一致同意照原计划召开大会。这说明，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与项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圆月 员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宣告正式成立。吴佩孚气急败坏，先是下令全城实行紧急戒严，“路上布满军警，特别是到会场一条大马路有千余武装军队，梯子形横列在马路上约半里之长”，妄图阻止工人开会。

面对反动派的威胁，项英没有退缩，他和林祥谦、施洋、林育南、史文彬等率领工人代表与纠察队员，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来到了普乐园戏院会场，保证了成立大会的按时召开。这时，吴佩孚更是恼羞成怒，派兵占住旅馆，“并禁止各饭店旅馆卖饭给工人代表吃，限令外地代表立即出境，郑州铁路工会亦同时遭封闭。”

为维护和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总工会迁移江岸办公，源日午刻实行京汉铁路全线大罢工。据罗章龙回忆，出席这次决策会议的有罗章龙、史文彬、项英、许白昊、林育南、李震

瀛、吴雨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项英不仅出席了这次决策会，还担任京汉铁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会后，项英与史文彬分头召集各分会代表紧急会议，传达总工会党团会议精神，强调全路一起进行，“在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不后退的。”随后，项英与总工会领导人及武汉方面的代表立即乘车南下。在列车上，项英和陈潭秋、林育南、林祥谦、施洋等，一起商讨罢工事宜，起草《罢工宣言》等文件（《宣言》的执笔人为林育南）。

源曰，京汉铁路工人争人权、争自由的总同盟罢工开始了。“总罢工命令下后，长二千余里路线，二万余工人之众，……不前不后，在一个时间内一致行动，……充分表示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一致的精神。”

缘曰，湖北督军肖耀南企图派军警强迫工人开车。张厚生奉命到江岸，命令军队驻扎江岸车站附近，同时派军警强行从工人住宅抓走两名司机，并在大智门车站贴出告示。告示说，从今天起客车照常行驶，可办理行包托运手续云云。

江岸分工会获悉这一情况后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这是直系军阀破坏罢工的阴谋，目的旨在企图利用广大旅客急于回家过春节的心情，挑拨京汉铁路工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为他们镇压工人罢工制造借口。于是决定，一方面派宣传员到大智门车站，向旅客宣传工人罢工真象，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派出纠察团员和工人，到火车房夺车要人。

纠察团员和工人群众 ~~因~~多人冲破军警的包围，终于抢回了被拘去的两名司机，但同时有 ~~缘~~名工友被捕。反动军

警以这 缘名工友为人质，要挟工会交出被抢回的两名司机。这更激怒了罢工工人。愤怒的纠察团员和工人群众立刻包围了江岸附近的张厚生的驻地，高呼：“这我工友！”“谁破坏罢工就坚决打倒谁！”等革命口号。张厚生无赖，要求工会派出代表谈判。

项英以罢工委员会总干事的身份，代表工人挺身而出，前往谈判。敌人将项英扣押，并用枪相威胁，要他下令复工。项英坚强不屈，拒绝了敌人的可耻要求。圆月 远日凌晨，工人群众为了援救自己的代表，前往包围军警，迫使敌人释放了项英。

圆月 远日上午，在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林育南等组织领导下，武汉工团联合会发动 员多名工人组成慰问队，各执慰问旗帜，携带大量慰问品，前往江岸刘家庙举行慰问大会。施洋、林育南、项英等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工人群众义无反顾，坚持斗争到底。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时 圆小时许，沿途加入 猿人，所过商民多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者，此种情形实为仅见。”项英、林育南、施洋、林祥谦等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圆月 苑日下午 圆时，张厚生（湖北督军肖耀南的参谋长）率两营军队，包围江岸，随即派一个军官到京汉铁路总工会，要求派出全权代表谈判复工问题。项英与林祥谦等身负重任前往扶轮学校与张厚生谈判。他们提出先撤退军队，再谈复工，遭张厚生拒绝。张厚生威胁林祥谦说：“我下令恢复交通，你下令复工，没什么可说的。”项英看出敌

人的险恶用心：根本不是来谈判复工，而是企图以谈判为名，逮捕罢工领导人。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项英委婉地想出了一个脱身之计，对张厚生说：“我们回去马上召集大家开个会，商量一下，再来回报。”张厚生得意忘形地说：“可以，快去。”走出扶轮学校，项英对林祥谦说：“你去通知各厂处的代表，我去通知纠察队到工会集合”，示意林祥谦不要回总工会，以便他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执行罢工的任务。可是这时已来不及了，林祥谦被一个军官紧紧盯住，被带往总工会。项英赶快去找纠察团。

下午 5 时，突然响起冲锋号声，“一时弹如雨下，人声沸腾，杀声震野，空场内遍地是尸，鲜血满地。”曾玉良等 4 人已在枪林弹雨中牺牲了，被枪伤的数十人和当场被缚的工人百余人被捆至车站月台上，适林祥谦亦在被绑之中。

这时，项英率 500 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冲进了车站，准备抢救林祥谦和被捕的工人，但是由于寡不敌众，没有成功。林祥谦等壮烈牺牲。与此同时，京汉铁路全线工人罢工都遭到反动军队的镇压。当晚，敌人又逮捕了施洋，5 日将他枪杀在武昌洪山脚下。

由上可见，项英在罢工斗争中，坚定无畏冲锋在前，表现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七”惨案后，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所属工团均被封闭，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在军阀的血腥镇压下，项英没有退缩，没有被吓倒。

在“二·七”大屠杀时，项英于工人纠察队中被乱枪击散，潜伏在江边，到黄昏时候，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

法租界长清里一位同志寓里，在这里建立起京汉铁路总工会联络处，与林育南、许白昊等调查工人死难情况，并成立济难会，进行善后工作。

反动军阀鉴于项英等仍在坚持活动，于猿月 圆日发出通缉令，通缉项英、林育南、许白昊等 苑名工人领袖。项英不顾被捕牺牲的危险，仍顽强地坚持工作，直到党组织通知他转移。

项英先转移到长沙，然后秘密潜入上海。

在长沙，项英会见了毛泽东。

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前夕，时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毛泽东，就曾给项英写信，信中说：“当前工人运动轰轰烈烈，作为领导人要看到工人的英勇斗争精神，同时，‘策略要慎重，要预防敌人的镇压’。”“二·七”惨案后，毛泽东领导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连续四次通电，严厉谴责吴佩孚等是“人类之公敌”、“万世之罪人”，呼吁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同申共愤，鸣鼓而攻”。

项英这时与毛泽东见面，进行了长谈，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检讨了“二·七”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李维汉回忆说，“‘二·七’罢工失败后，党中央曾有对‘二·七’罢工事件的指示信，要我带给许白昊和项英，因接信地点汉口‘真报’和施洋律师事务所都已被破坏，罢工已失败了，所以将信毁去，将钱带去长沙。到长沙的当晚，在自修大学遇见项英正同毛泽东同志谈话。”于是李维汉将钱交给了项英，并向项英说明了带信的经过。项英与毛泽东又研究了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加深了对形势的认识。

随后，项英离湘赴沪。在上海，他与林育南立即设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驻沪办事处，揭露军阀残杀工人的真相，联合全国各界同胞继续同军阀作斗争。项英与林育南还主持编写了《二七工仇》，该书记述了“二·七”大罢工的英雄史实，辑录了罢工的各种文告和照片，讴歌了“二·七”烈士的崇高革命气节，鞭答了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鼓励工人阶级牢记血海深仇，把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七”罢工的全过程表明，从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到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诞生；从罢工决策的制定，到“二·七”罢工的失败及善后处理，项英一直是一个重要角色，处于领导地位。因此，他作为“二·七”罢工的领导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留守苏区

1934年5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中央分局，开始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五人组成，后又增加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项英为书记，陈潭秋为组织部长，瞿秋白为宣传部长。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

随后，中革军委在转移途中，于 1934 年 12 月 18 日致电项英：“中央军区应从 12 月 18 日起即宣布成立”，项英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中革军委要求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扩大地方武装，镇压反革命，同时前运粮弹，后运重伤病员。

当时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准备在有利条件下配合红军主力反攻，恢复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城镇和地区。

党中央当时向项英他们规定，必须等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全部突围到湖南以后，才能向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公开宣布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在这以前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作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是：归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主力红二十四师（只有二千余人），地方红军独立第三、第七、第十团；江西、赣南、闽赣、福建等军区分别指挥的一些独立团、营，共一万六千余人；连同政府机关、伤病员，共约三万人。看起来，留下的人数并不算少，但有枪的少，多数是徒手或持大刀、梭镖。正如项英 1934 年 12 月 18 日关于中央军区情况给博古、朱德、周恩来的综合报告中，讲道：“独立师、团……平均梭镖占二分之一”。特别是老弱病残多，一万多伤病员还需要别人来保护和照顾。用这些力

量来抵御八万主力红军未能抵挡的五十万国民党军的进攻，那是难上加难的。

这就是说，当时落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肩上的领导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当时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筹划工作，由于只是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的极小范围内进行，所以项英也不清楚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行动的真正意图。至于项英被留下来坚持斗争，那是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确定的，项英并不知道。

对于怎样看待项英被留下？在那五十八年以后的 1980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原顾问委员会常委陈丕显在一次谈话时讲道：“项英那时被留下来打游击就有被整的意思。……项英当时要是被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喜欢’的话，也就不会被留下来打游击了。”

然而，项英临危受命，对党中央让他留下坚持斗争，二话没讲，便以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为重，顾全革命大局，以对党无限忠诚的高度责任感，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勇敢地担当起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坚持斗争的重任。

同年 10 月 20 日，项英遵照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在边筹建领导机构的同时，边指挥红二十四师和各军区的独立团、营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务，让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脱离原来阵地，开赴指定地域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在接防过程中，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以积极的动作，开展游击活动，阻滞敌人，严密封锁主力红军行动的消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集结，进行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项英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领导各军区积极向中央红军主力输送兵员。几天之内，七个补充团先后开赴指定集中的地区，分别补充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增强了主力红军的战斗力量。

同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由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第一野战纵队（“红星”纵队）和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机关组成的第二野战纵队（“红章”纵队）开始从瑞金地区出发，向战略转移前的集结地域于都开进。项英和留下的同志，同当地群众一起，为他们送行。

同年 12 月 12 日，项英在瑞金县的梅坑，送别了中共中央和军委总部领导人及最后撤离的队伍。当他和博古、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话别时，心情是异常激动而沉重的。他是多么想和他们一起出征啊！可是，党中央已决定他留下坚持斗争，他就愉快服从，坚定地表示：他一定和中央分局其他领导人一起，率领中央苏区军民，为保卫用鲜血换来的苏维埃事业而奋斗到底。

项英和党中央、军委总部的领导人告别时，热泪盈眶，千叮万嘱，然后目送他们向远处走去，直到连人影也看不清时，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党中央离开瑞金后，留下中央苏区这个烂摊子就由项英为主来收拾了。

同年 12 月 12 日上午，项英赶到医院看望陈毅。此时，陈毅因在当年 10 月兴国老营盘作战中负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几天前才做手术，还躺在病床上。项英首先询问了陈毅的伤势，表示了亲切的慰问。接着，他向陈毅传达了党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和规定要求。陈毅由于事前已从周恩来

那里得知一些关于战略转移的精神，当即对形势分析和迅速分散游击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项英在告知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部署、保密方面的要求以后，先就如何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等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

当天下午，项英又同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就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等问题，分别作了交谈。

同年 8 月 5 日上午，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分局第一次会议。他鉴于这次会议内容重要，派人将陈毅用担架抬进会场。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均出席，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在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列席会议。

会上，项英在传达党中央、中革军委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和各项要求，宣布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正式成立后，作了重要的讲话。

项英指出：党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能否胜利地进行战略转移，关系到现时全党、全国革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我们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和党政干部，一定要认清这个革命大局，按照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开展积极的行动，以掩护、策应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项英认为，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作为革命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组织原则和行动准则。因此，我们首先要考虑怎样做好对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的掩护工作。如果我们在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还没有离开苏区时就开始搞疏散，那就会造成混乱。

项英说，现在形势很严峻，苏区范围越来越小，当红军主力突围后，敌人对我们留下的红军及游击队要必定会加紧“清剿”和进攻，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要作艰苦斗争的准